

· 哲学研究 ·

# 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

杨 慧<sup>1,2</sup> 杨慧林<sup>1</sup>

(1.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2. 青海师范大学 外语系,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 试图从其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中找出走出当代西方哲学困境的出路, 尽可能地减少后现代思潮带给中国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 困境;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6)11-0020-03

作者简介: 杨慧, 女, 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杨慧林, 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文学院院长。

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是一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相互摩擦、相互交融的历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为古希腊社会走出感性欲望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笛卡儿的个体理性开启了对信仰一统天下千余年的所谓“黑暗世纪”的重思之门; 18世纪的启蒙理性认为凭借知识的钥匙就可以打开人们的眼界, “照亮”(enlighten)人们的头脑; 19世纪无疑是理性扩张的时代, 科学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满足, 因而科学理性也就自然地被哲学界奉为圭臬。19世纪后半期,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 科技对人的异化, 理性自身的局限, 非理性开始了对理性的发难。开非理性主义之先河的是唯意志主义创始人叔本华和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 后经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柏格森为代表的人生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胡塞尔的现象学, 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 以马尔库塞、弗洛姆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的推动, 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也到了极致。也许任何问题只有到了无路可逃的绝境时才会有解决的方式, 所以当德里达将西方形而上传统拆解得支离破碎时我们才得以重回逻各斯(λογος; Logos)的起点寻求答案, 也许只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才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一、“上帝死了!”——理性的陨落

古希腊哲学以崇尚理性为核心, 也是对古希腊神话世界的一种反拨和发展。古希腊神话世界是以“厄洛斯”(ερως Eros)为运转中心的。关于“厄洛斯”的神话传说有两个版本: 一是创世之初作为宇宙推动力而存在; 一是作为美神和战神的儿子存在。柏拉图对“厄洛斯”神话的改编就充分证明了哲学作为对感性世界道德的提升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对其哲学理想一种殉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情欲, 并认为理性是灵魂的主宰, 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不过是灵魂的附属物。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的著名命题。在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之后, 理性成了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宗教、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东西必须放在理性法庭面前进行审判。斯宾诺莎认为意志必须遵循理性的同时, 又认为理性并不是绝对的, 并试图把二者统一

起来, 但他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统一的矛盾。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则宣称理性应是我们最高的法官,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 主张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科学、理性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 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sup>[1]</sup>他把理性贯彻到一切领域, 把理性看作无限权力和历史主宰, 并由此导致了对理性的崇拜。

非理性哲学家首先向理性的权威发起了攻击, 尼采讥讽它为“幻影崇拜症”。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 左右两千多年西方文明之一的理性主义随之终结了。海德格尔甚至向世人宣布: “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最冥顽的敌人, 这时候, 思想才能启程。”<sup>[2]</sup>非理性主义者认为把理性提高到无所不能的高度, 从而贬低、压制、扭曲非理性的东西是古典哲学的偏误, 他们认为, 理性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人并不能理性地控制自我。

## 二、非理性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必然性

在对理性的非难和斗争中, 非理性主义成长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潮。

### 1. 古希腊时期的非理性观

尽管古希腊哲学崇尚理性, 但非理性主义仍然以先验的神秘形式存在着。与奥林匹斯宗教同时存在于古希腊社会的奥菲士宗教(Orphism)也称俄耳浦斯教就融合了东方波斯宗教的神秘仪式, 经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非理性的神秘论在柏拉图的“灵魂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使是被以“不信神”的罪名处死的苏格拉底也有着虔诚的信仰, 只不过他的神不是奥林匹司山上为所欲为、道德品行可疑的神, 而是一种哲学的“厄洛斯”。非理性的因素在斯多葛派(Stoics)的苦行主义, 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的快乐主义, 以及犬儒派(Cynics)的怀疑主义那里表现为对个体道德修养的要求, 尤其是被称作“基督教叔父”的古罗马帝国初期后斯多葛派的代表塞涅卡, 崇尚自然论和个体修为, 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先验的非理性主义。

### 2. 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非理性主义

公元 1—2 世纪从犹太教逐渐分化出来的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中与希腊哲学既有融合又有斗争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达 1000 余年之久。西方传统中的两希之争事实上是理性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尽管有亚历山大城斐洛、奥古斯丁、普罗提诺、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做的整合, 尽管基督教有着以哲学为其根基的系统神学, 但这种绝对的信仰无疑还是非理性的。无论是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的圣爱伦理 (Αγάπη; Agape) 还是德尔图良的“因为荒谬所以信仰”都是对信仰的非理性性质的实证。康德也在认识论上揭示了理性的矛盾, 认为理性不能把握“物自体”, “物自体”是不可知的, 也为非理性的信仰留下了空间; 费希特的道德宗教观和谢林客观唯心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前提下, 也重视非理性主义因素的作用。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他并没有否认社会历史中存在的非理性事实。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由理性、意志和爱的三者统一, 其中也包含了非理性因素。由此可见一度被认为是理性的鼓吹者的哲学, 其自身就沾染了非理性主义的倾向。

### 3. 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一是因为西方形而上传统有着自身的弊端因而必然走向终结; 其二是科技进步对人的异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是产生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 以德法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理性主义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的旗帜, 自身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和矛盾。启蒙理性将理性绝对化, 不仅用于科学, 并且普及到人文学科。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 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 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 过去被奉为神圣的理性的秩序已弊病百出。作为对启蒙理性的反拨, 卢梭和康德最先意识到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如歌德、席勒、谢林等都为人的非理性欢呼过。浪漫主义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美学流派, 它同时折射着一种为社会变革寻找出路努力, 因而还体现着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其次是 19 世纪中叶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让人沮丧、时局的动荡, 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威胁使悲观消极情绪最终孕育了这一思潮。而德国古典哲学一味追寻抽象理性, 忽视人的创造性和潜力, 忽视了欲望、意志、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把思辨规律作为惟一其他的思维形式的缺陷使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一举抓住其要害并将其攻破。叔本华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抬高到世界本原地位, 认为先有人的意志后有人的理性, 非理性的求生意志“是自在之物, 是这世界内在的蕴涵和本质的东西。”<sup>[3]</sup> 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的本质与本原不是理性, 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体验”。19 世纪后半期, 尼采和柏格森进一步推进了现代非理性主义, 对非理性主义思潮起了承前起后的作用。尼采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成“权力意志”和“超人”, 把人的权力意志看作世界的本原, “世界是非理性的东西”<sup>[4]</sup>, 他的日神 (Απόλλων; Apollo 阿波

罗) 与酒神 (希腊神话 Διονύσος 狄奥尼索斯; 罗马神话 Bacchus 巴克科斯) 分别代表了梦幻与醉狂, 将非理性发展到了极致。柏格森认为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 而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不停歇的生命冲动, 要把握生命的真谛, 只有依靠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被称为“无意识之父”的弗洛伊德则用欲望冲动解释一切, 并通过对人的心理结构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来分析人的存在。

### 4. 存在主义与后现代非理性主义

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流派, 它认为“常人”的“沉沦”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 以萨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是个别的, 非理性的, 烦、畏、死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二战后, 存在主义在西方成为时髦哲学, 这与当时人们的消沉颓废、悲观失望情绪密切相关, 由于找不到出路, 从而玩世不恭, 放荡不羁, 这使他们对科学和理性更加失去信任, 认为依靠科学和理性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的人生问题。海德格尔把人们连自己的身份也无从确定的生存状态称为“无家可归”状态, 而萨特则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和冷漠用一句话来概括: “他人就是地狱”。

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是彻底的非理性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将 20 世纪人类反思检讨理性的触角延伸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马尔库塞抗议工业文明对人的不必要压抑, 弗洛姆、哈贝马斯关于技术与科学对人的控制的观点, 更多地表现了现代西方思想家对现代的一种反思。从海德格尔的“解构”到德里达的“解构”, 我们发现了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双重否定。海德格尔的“解构”还算温和, 它是对传统批判的重新定位而不是推翻, 他的解构含有建构之意——即重建西方形而上传统, 德里达的“解构”却极具颠覆力量。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基本假设——能指和所指的对应性的质疑, 德里达对语言的本质做了新的界定。能指是一种意义已被意识的基本结构定论的符号, 而所指是指向特定经验的不确定特征的符号。不确定特征是“赤裸的”(经验的事实)。不但如此,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因“概念”与“声音”的不对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语言的不确定性到意义的不确定性, 德里达最终将西方理性中心传统扫荡一空。

### 三、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重新定位

理性主义是西方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 从古希腊的“爱智”传统到笛卡尔的个体理性再到启蒙理性, 它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非理性主义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它是对近代西方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万能和理性独断的公开挑战。非理性主义者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 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研究, 虽然这些研究有时会走向另一种极端, 甚至走向反理性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实际上, 他们对非理性活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丰富了人们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 是对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重要的补充。非理性主义不但对个体理性对感性欲望的压抑做了难能可贵的反抗, 而且对科技理性对人的异化做

了同样的反抗。但非理性主义的滥觞由于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情感、本能的作用,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难辞其咎,对后现代人的异化与放纵,道德的沦丧也责不容脱。存在主义尽管强调个体对自身生命的责任,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个人的自由是否是生命的全部?没有信仰的支撑,人是否能为自己负全责?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都在各自的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但却不能将它照搬于中国。当前我们的国情需要稳定的环境,需要理性精神,这并不是排斥个体的情感和自由。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种种批判可以唤起我们在高压和强权方面的警觉,但同时理性对非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却不可“等闲视之”。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贬抑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创造的人类异化的一种曲折的批判和抵制。西方世界先后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三、四次技术革命。科技使社会长足进步但同时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科技导致了对人的控制,使个人丧失主体性,科技对个人来说,成为不可控制的异己力量,它导致了个人的无力感和依赖感,导致了西方普遍的技术悲观主义,科学使人重新沦为奴隶,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神的奴隶,而成了机器、技术的奴隶。人类从神那里夺回了人的权利,成了自己的主人,却又在机器面前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人的自由,加深了人的异化。人类在科技和生产力的巨大压榨下,成了平面的、空心人,单向度的人,也是畸形的片面的人。对科学和技术的不合理使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一是使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二是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压抑和扭曲。”<sup>[5]</sup>

#### 四、走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樊篱

尽管非理性是对理性的反拨,但其本质与理性主义一样,是对理性的过分依赖以至使其膨胀,只不过理性主义侧重科技理性而非理性主义侧重个体理性。理性主义帮助西方从一千年的信仰专制中走出,以科学解除了人类的蒙昧,非理性主义更是将信仰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信仰是否真的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为何理性主义带来了人的异化而非理性主义带来了彻底的虚无?尼采的“上帝之死”让虚无主义无可避免地站在了历史的终端,使西方文明最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

也许只有在退到无路可退时,思考才会重回起点: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危机其实是因为从一开始的误解造成的,而这

种误解在两千年的发展中不但未被纠正反而变本加厉。逻各斯(λογος logos)其实包含着双层意义:oratio言;ratio思,即rationality理性。所以人既是语言的动物也是思维的动物,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外壳,其本身就是思维。可惜的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言,自己的思,而忘记了在希伯来语中 logos 的深层含义不是人之言 word 而是圣言 Word(即《圣经》开篇的“太初有道”的道),不论它是宇宙的最高秩序,还是上帝之言,也不论它以哲学的方式存在还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存在,它始终是存在着的而且它是必须存在的,因为伊凡·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若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其实即使是尼采本人也为上帝之死痛苦不已:“上帝死了!上帝仍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我们怎样才能安慰自己——我们,一切凶手中最大的凶手!”<sup>[6]</sup>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理性和非理性的局限,如果我们不但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他者”(the other)而且尊重那个无所不在的“the Holy Other,那么陷入困境的文明就会拨云见日。

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虽然颠覆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基础,然而这种颠覆的建设性实大于它的危险性,这犹如长生鸟的火中重生,拆除后的死地才能孕育建构中的新生。他杜撰的词“différance(延异)是对虚无主义“无”的焦虑,是对“不存在上帝”这个现代怀疑主义的忧虑,是以形而上学和图解主义针对“无”发动的战争,是创建终极或先验意义的热情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奉献给一个假想的社会——一个不断拖延的神圣的人类共同体社会。若没有这个被无限拖延的“最后判词”,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怀疑主义和信仰之间的辩证主义将毫无意义。

[收稿日期] 2006-07-12

#### 参考文献

- [1] C. D. Yonge. The Works of Philip New Updated E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3.
- [2]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3] 尼采:《权利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4]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 尼采全集(第二卷)[M]. 127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98.

[责任编辑:郭洪]

## Stepping out of the Crisis of Rationalism and Irrationalism

Yang Hui Yang Huijin

Abstract: From analyzing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sm and irrationalism in the wes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of them, the thesis tries to find a way to step out of the crisis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dilemma of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the post-modernism upon Chinese value systems as well.

Keywords: rationalism; irrationalism; dilemma; post-modernism